
从体裁到题材： 上海《时报》新闻业务变革及效应探析¹

余玉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南昌 330031）

【摘要】上海《时报》以业务革新著称。该报在清末民初存续 35 年，先后由狄楚青和黄伯惠经营，两个关键时期的新闻业务革新所聚焦内容不同，前期在报纸版式、时评、新闻专电、新闻通讯方面颇具成效，后期新闻业务改革发生转向，在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及图片新闻方面大胆探索和创新。前期以“体裁”为主和后期以“题材”为核心的业务改革，暗合了从形式到内容对中、西方新闻业务沿袭和模仿的历史脉络。两个阶段的业务探索契合不同时期的社会需要，从新闻业务革新的不同方面推动了近代报刊业务的发展。

【关键词】上海《时报》；新闻业务；新闻体裁；新闻题材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4-0083-08

上海《时报》是清末新政改革期间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与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并驾齐驱，故时人把“申”“新”“时”三报并称。这份大型日报自 1904 年 6 月 12 日创刊至 1939 年 9 月 1 日终刊，以 1921 年报馆易主为界，分别由狄楚青和黄伯惠主政而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时报》作为清末民初报坛中的风云报纸，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新闻舆论等领域都曾发挥过一定作用，但它在业务革新方面的影响远超过引导舆论的作用。纵观《时报》在业务改革的两个关键时期的作为，前期主要集中于“新闻体裁”方面的变革与创新，后期则主要着力于“新闻题材”方面的突破与探索（当然前后阶段业务改革也有交叉），两个阶段的业务革新重点不同，内容相异，以致前、后时期《时报》风格迥异，各具特色。

目前，学界对晚清大报的研究如火如荼，而其中的《时报》却备受冷落，还无人对之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成果问世。单就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来看，通过中国知网进行主题检索发现，到目前为止，研究《大公报》的论文达 4820 篇，《申报》研究约 1992 篇，《新闻报》研究有 444 篇，而关于《时报》的学术论文仅 20 篇，这份与申、新齐名且历史悠久而名重一时的报纸，研究成果与它们相比却相形见绌。基于此，本文抓住该报历史中最核心和具有典型意义的成就，在务实和可见的背景下观照《时报》业务革新，探究其新闻业务变迁的过程和影响，具有一定的学理和实践意义。

一、新闻业务革新：狄楚青时期《时报》对“新闻体裁”的有效探索

¹收稿日期：2017-04-10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上海《时报》新闻业务变迁及其效应研究”（16XW04）。

作者简介：余玉（1972-），男，江西湖口人，讲师，新闻学博士，从事新闻传播史论研究。

《时报》创办人狄楚青主持前期《时报》长达 17 年，一直致力于业务改革。他创刊该报时阐明了其报业革新观点：“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耳。”^{[1] (P134)} 尊此旨意，狄楚青在业务上大胆探索，在版面革新、内容创新、技术趋新、观念更新等方面锐意进行新闻业务改革。《〈时报〉发刊例》阐释了业务革新的具体措施，共列出了 25 项内容，几乎全部针对报刊业务而设，涵盖了报纸业务的许多层面，重心是围绕报纸版式和新闻体裁，包括时评、专电和新闻通讯等方面着力革新。

狄楚青为了探索新闻体裁革新路径，首先对报纸版面形式进行大胆变革。狄楚青不随流俗、不沿旧习、独创一格，发刊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西洋白报纸双面印刷的对开大张报纸，一改我国几十年来老套的书册样式，首创对版式，版面摆脱横长式，采用分栏式版面，对编排、栏目、标题、字体等都有许多改进，改变了以前单调拥挤的版面编排形式，分版编辑，掺用大小字排印专电、时评，版面设计清晰脱俗，层次分明，胡适曾感叹：“它内容与办法也确然能够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2] 1932 年，《时报》创刊一万号时，民初名记者徐凌霄也撰文谈到：“《时报》首先取法英伦敦泰晤士，创办之时，即具世界眼光。编辑撰述，均取清爽生动，一扫固滞干燥之病。”^[3] 林语堂对《时报》也赞叹不已，“《时报》的编辑方针别开生面，它在业务上的改革，令当时的新闻界耳目一新”^{[4] (P112)}，《时报》成为中国报纸朝现代版式变革的转折点。

（一）创设时事评论

我国近代报刊对政论一向重视，开“文人论政”之风。19 世纪末期长篇政论垄断了近代早期报刊的评论版面，进入 20 世纪，活泼、精短的时评活跃于版面，尖锐犀利的评论形式一改过去评论冗长之风，使评论文体长短相济配置于版面，“批评简而明，论说长而详，批评指其事之是否，论说指其事之原委，批评不常有，论说常有，此犹戚继光之用兵，长短以相卫也”^[5]。狄楚青所创《时报》首先将“时评”这种新的报章文体移植于大型日报，开辟了《时评一》《时评二》《时评三》三个栏目，配合当天重大新闻，发表短论。陈景韩是这一“独创体裁”的推动者，他“首立时评一栏，分版论断，扼其机枢”^{[1] (P133)}，逐日发论，抨击国事，持之以恒，轰动一时。自此，《时报》时评开中国报纸言论由“论”入“评”之先河，为我国早期公共领域建构增添了新的羽翼。

时评的品牌效应明显，推动了我国评论体裁的发展。《时报》创刊前的《申报》《新闻报》等老牌民营报纸也常议论时政，并开设相关栏目，但它们所载评论在形式上与政论报刊无大区别，犹如“报章八股”，长篇大论，评论内容往往不咸不淡、不痛不痒，评论态度暧昧，这是民营报刊的生存策略，但对于读者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却无足轻重。《时报》时评一问世就大放异彩，不但活跃了报纸版面，使读者耳目一新，而且传播效果极佳，很快就对报界产生辐射效应，致使当时报界仿效者甚众，影响极为深远。

“《时报》创始后，曾于社论外别立时评一栏，分版论断，扼其机枢，与今之模棱两可，不着边际者截然不同，故能风靡一时。”^{[6] (P3)} 在《时报》的影响下，当时的《新闻报》就借鉴了《时报》的分版设置时评的方式，不但把一版电讯、二版通讯、三版本埠新闻分成“新闻一”“新闻二”“新闻三”，而且各版分别配短评，成为“新评一”“新评二”“新评三”，简短时评，言简意赅，很受读者欢迎。

（二）拓展新闻专电

新闻专电发端于《申报》，此后，在《大公报》《新闻报》《中外日报》等大型报刊上陆续出现。《时报》一创刊就非常重视新闻专电，不是时断时续登载，而是每天连续刊登，成为报纸不可或缺部分，“以前报纸自己每日没有专电，从《时报》起，方每日有专电了”^{[7] (P132)}。可见，《时报》刊载专电是该报的一项重要举措，不但专电成为《时报》的常设栏目，坚持逐日刊登数条专电，后发展为整版刊载，而且刊载专电的数量、地域和类型三个方面都得以拓展。《时报》创刊之初措置“专电”栏目，每天有数条专电刊出，但国内外专电混合编排，题文字号不分，编排略显呆板。数月后对专电编排越来越讲究，重要专电加大字号，加粗字体，显得醒目，而且专电数量增多、地域扩大，栏目设置从一栏变为两栏，自 1905 年 2 月 7 日始，电报分为电报一（国内）、

电报二（国外），国内与国际归类编排，并成为专电栏目设置的常规做法。1908年3月2日，撤除电报一、二的分类法，直接冠名“专电”栏目，专电类型增多，逐渐增加“译电”“特约路透电”“要电”“战电”“公电”等多种专电栏目。

民国成立后，《时报》上专电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专电数量、版面位置、版面大小都比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有时整版刊载专电。《时报》专电除了数量大增，专电来源和类型也得以拓展。首先，从专电地域看，专电来源从相对狭窄到逐步走向全面，从国内重要地区和城市扩展到中等口岸和城市，并兼及国外新闻专电。其次，从专电类型看，从不分类别的混合专电到分为专电一、专电二，专电、译电、要电、战电、杂电等多样专电类型出现，国内、国外分开，战时加设专电，版面上的专电分类编排，条目清晰，字号字体变化，分条缕析，方便读者阅读，专电成为《时报》版面的一道风景，是吸引读者的重要栏目。同时促使其它报纸设法效尤，民初报界对新闻专电竞相采用以应对报业竞争，此举从整体上推动了我国新闻传播观念的发展。

（三）首创特约通讯

“与专电相辅而行的‘特约通信’，也从《时报》创始，而为上海各报陆续采用了”^{[8] (p339)}。民国成立后，《时报》开创通讯文体，以便读者了解政治中心的动态，获得确切且重要的时政新闻，揭示官场内幕，提供独家报道。《时报》把谙熟政情、思维敏锐、文笔极佳作为选派驻京访员的标准，率先延请一些有政治视野、善于分析、把握时局且文笔优美的文人为驻京特约通讯记者，当时的黄远生是最为理想的人选，“北京特约通信，系《时报》与黄远庸创始的”^{[7] (p518)}。黄远生活跃于北京官场，熟悉政情，文笔酣畅，观察时局，分析世事，很有洞见。他于1912年5月受聘为《时报》驻京特派访员，为《时报》采写的“北京通信”，“作品议题既涉及重大政局、重要政治人物等宏大命题，亦有个人所见、所闻、所感等微观叙事”^[9]，深受读者青睐，《外交部之厨子》《龇日记》《铸党论》等都是脍炙人口的通讯名篇，为报纸带来良好声誉，引起其它报纸踵行。

自从黄远生成为《时报》首位驻京特派访员后，上海各报纷起仿效，争派驻京访员采写京城独家内幕新闻，《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不惜重金派驻京记者，加强政治中心的报道，从此，驻京特派访员制度真正建立起来。1915年黄远生喋血美国旧金山后，《申报》于1916年改聘邵飘萍为驻京访员，他同时为《时报》写稿。当时活跃于北京地区且名重一时的访员还有《新闻报》的张季鸾和《申报》《时报》的徐彬彬等。特派驻京访员采写的“北京特约通信”对时人影响极大，老报人徐铸成回忆道：“而对我最有吸引力，看到必细细阅读的，是几家报纸的‘北京特约通信’。每篇都署了名，如《申报》的飘萍通信，《新闻报》的一苇通信，和《时报》的彬彬通信。文笔各有风格，而都能夹叙夹评，酣畅地或曲折折地描述出北京政局勾心斗角的内幕和一些军阀、政客们的面目”^{[10] (p25)}。通讯文体在民初记者的大量实践中逐步确立并定型下来，通讯体裁风靡一时，至今仍为新闻报道的重要体裁。

二、新闻业务转型：黄伯惠时期《时报》对“新闻题材”的不断变革

狄楚青因遭受打击无心报业，1921年将《时报》转手黄伯惠，黄氏继续主政《时报》长达18年，重新开启《时报》一段新的旅程。黄伯惠盘下《时报》后，力图摆脱接办之初的颓废之势，对报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办报设施、报纸风格和内容编排方面都进行了大胆革新，报刊业务发生转型，走上民营报纸发展之路，报纸出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黄伯惠不讲‘政治’，一心追求的是‘艺术’”这主导了报纸风格的转向，凸显娱乐消闲性的大众化风格。他仿行美国赫斯特的“黄色新闻”路子，实行大型日报“小报化”，采取精编策略，“减少篇幅两大张——精编内容，采用新闻版面，套印红色标题，重要新闻及照片用彩色套印，注重体育、社会及经济新闻”^{[12] (p107)}。显然，都市文化、行业竞争与报人旨趣是报纸风格转向的主导因素。《时报》通过黄伯惠的经营，“不料在报坛上开出了一朵奇葩”^[13]。

（一）都市消费视野下的社会新闻

黄伯惠接办《时报》时正处于上海都市消费文化的繁盛时期，“消费文化的商业化、多元化、大众化及社区差异，是民国时期上海都市居民生活方式变动的一个侧面”^{[14] (p143)}，后期《时报》的业务革新正契合上海市民的浮华都市生活所构建的文化氛

围，社会新闻能极大满足他们的阅读欲望，为他们提供了可以解闷、除烦的精神食粮，符合他们的文化消费心理。《时报》的社会新闻数量和质量连年提升，发展轨迹较为清晰，由零星散点式刊载向集纳式编排发展，再进入典型长篇报道阶段而达到巅峰，尔后逐渐呈衰落趋势。尤其在1928年陆续刊出重磅社会新闻，或直戳社会本质，或触及人伦传统，或拷问人性本真，常常配以图片，通过煽情表达和人为炒作，社会新闻在新闻界闪耀一时，产生轰动效应，后从发展高峰逐渐回潮而走向平静，最后被边缘化。

《时报》社会新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内容上看，包括趣闻、灾变、伦理、婚恋、世相、偷盗、诉讼等有关社会现象、社会风貌、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等，也有一些色情、淫秽或有损风化的内容。从形式上看，写作上通过煽情、夸张、耸人听闻的词句等表现手段，或编排上通过大字、套红、惊叹号、彩色图片等方式进行报道。尤其对重大典型性社会新闻进行连续追踪报道，所占版面大，波及时间长，民众关注度高，对社会影响极大，如“刘海粟人体写生案”“马振华情死事件”“黄慧如、陆根荣主仆恋爱”等，以离奇案情、曲折情节、煽情表达，报道绘影绘声，深掘人性，触及社会本质，颇具轰动效应。

《时报》报道社会新闻能较好地处理消闲与责任的辩证关系，提升了新闻品质，连续追踪式的重大社会新闻报道表现尤为明显。社会新闻不但为读者提供了都市消费的精神体验，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大大满足了浮华都市读者的阅读心理，而且新闻还往往涉及人伦，拷问人性，触及人文，直指伦理道德和社会深层本质，体现出媒体的人文情怀。当时轰动一时的“马振华情死案”，《时报》在七天内进行了连续跟踪报道，前四天通过煽情表达、巧设悬念、图文并茂等多种方式翔实报道事件来龙去脉，通过广泛传播集聚了一批都市消费群体，满足了读者的“信息饥渴”，但读者没有停留于冷漠、被动的“观看”层面，因为《时报》后三天报道转向观点呈递，读者、报社和当事人及家属进行多方观点交锋，理性和非理性声音杂陈，把新闻报道推向更高层面，“将‘公众同情’询唤了出来，让市民不仅是简单地聚集起来‘观看’或者说理性地认知事件，而是共同从纯感官层面上‘感受’着它”^{[15] (P14)}，以致读者同事件主人公共同悲愤，“感受”事件的真谛，部分读者走向更高层次的自觉，理性表达诉求和观点。该事件通过《时报》两个不同层级的报道，事件意义被充分发掘出来，在读者中产生“涟漪效应”，传播效果明显，社会影响深远，通过搭建公共平台体现出《时报》的责任担当。《时报》的许多典型社会新闻都是沿着这种报道思路展开，通过新闻报道给受众提供了讨论话题和公共平台。

(二) 独树一帜的体育新闻

黄伯惠接办《时报》适逢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他把体育新闻作为《时报》的一项主攻内容，不但契合了社会和读者的需要，而且成就了后期《时报》走大众化之路。当时的《申报》《新闻报》都没有足够重视体育新闻报道，《时报》的体育报道却独树一帜，成为出奇制胜的法宝。

《时报》体育报道内容广泛，涉及田径运动、赛马博彩、球类比赛、溜冰滑雪及各类大型运动赛事等，报道范围不但关涉上海的体育赛事，而且波及周边，全国体育比赛乃至国外体育赛事都派驻外勤记者。举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外的重大体育赛事，如世界运动会、远东运动会、全国运动会、省级运动会与埠际体育比赛等，《时报》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翔实、及时报道，报道周期长，记者抓住比赛前后、赛场内外进行全方位报道，既有赛前预热与开幕和闭幕报道，又有赛场风姿速写，还有场外花絮素描、体育明星特写以及观众百态呈现等，文字报道绘声绘色，图片新闻现场感强，并在比赛期间以“特刊”形式开辟大型体育专版，还适时推出《图画时报》，选登大量优美、生动且现场感强的体育图片，不仅悦目，而且值得珍藏。《时报》以鲜活、翔实的多彩新闻赢得读者青睐，使我国体育事业繁荣初期的广大民众处于体育狂欢之中。体育新闻不但带来读者对《时报》追捧，而且连运动选手也爱不释手，“河北省统领队赵文藻说，时报消息确属灵通，我们的选手没有不喜欢看的”^[16]，第六届全运会铁饼和铅球冠军的陈荣棠也曾为《时报》题词：“我很高兴看时报，因为消息很正确，而且每天有画报。”^[17]狂欢与理性统一是《时报》体育报道的鲜明特点。首先，《时报》体育新闻契合了我国发展初期繁荣的体育事业，给我国民众带来欢乐和刺激，呈现体育狂欢景象。尤其每逢重大体育赛事，《时报》提供的体育新闻盛宴给民众带来快慰，对缓释民众的身心疲惫大有裨益，因为“狂欢化是民众情绪的一种定期宣泄和释放，不但不会对既定秩序构成任何威胁，反而使民众内心的压力和积怨得到缓解，使积压的社会焦虑找到宣泄口”^[18]。与此同时，在许多大型赛事期间，《时报》不时刊出充满理性的文章，如吕叔安的《什么叫做体育》(1927-09-05)、黄警顽与王庚的《大会给与我们的教训》(1927-09-05)、郝更生的《我国首次参加亚林

匹克大会之我见》(1932-08-02)、李惠堂的《论体育真谛》(1932-08-08)等,这些反思文章蕴涵阐释体育真谛、传播体育思想、弘扬体育精神、理性评论赛事等内容,对于全面理解体育内涵、批评片面体育思想、检视我国体育弱点、理性看待比赛结果,以及参加或举办体育赛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等方面具有思辨意义,给体育狂欢中的民众及时投以清醒剂,促国人反省,使民众在体育新闻狂欢下不致丧失自我,体育新闻品质在狂欢与理性的统一中得以提升。

(三)视觉传播中的图片新闻

前期《时报》具有新闻价值的图片很少,而讽刺画、风俗画及风景画等图画倒是占有一席之地。黄伯惠接办《时报》后,把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新闻作为版面重要内容之一,与社会新闻和体育新闻一道实践他的“黄报”之路。所以,后期《时报》新闻图片运用很有特色,图片新闻数量、质量和地位相较于前期《时报》大相径庭,出色与出彩的图片新闻使《时报》版面鲜光夺目、煜煜生辉,当时著名的申、新两报难以企及。据当年的《时报》摄影记者郎静山回忆:“新闻照片在《时报》上刊出后,读者十分欢迎,几乎每期有照片的《时报》,其销路就会多一千余份。这种用图片传递新闻的形式,当时对其它报社来说是望尘莫及的。”^[19]

1925年是后期《时报》新闻图片运用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三四年间,《时报》的新闻图片只是零星点缀于版面,图片处于补充文字新闻的配角地位。1925年之后,新闻图片逐渐增多,到了1928年,版面上新闻图片呈井喷式发展,图文并茂的编排特点凸显出来,图片新闻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得以彰显。大体上看,《时报》新闻图片主要运用于政治新闻、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和军事新闻中,这四类图片新闻刊发形式和时机不尽相同,其中政治新闻图片刊发集中于较重大政治事件期间,而且大多附属文字报道,也有少量独立新闻图片;社会新闻图片常常在重大典型性社会新闻报道期间刊登,一般也是配合文字报道,但平时也刊载具有新闻价值的独立意义的社会新闻图片;体育新闻图片基本集中于重大体育赛事和本埠或埠际体育比赛期间,图片数量多,刊载周期长,呈现规模性效应;军事新闻图片只在战争期间出现,基本上是辅助文字报道。

《时报》的新闻图片在社会新闻和体育新闻报道中表现非常出色,《时报》“经常着重当地社会新闻和体育消息,附以新闻图照,使报道生动”^[20]。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重大社会新闻,新闻图片常辅助社会新闻报道,在详尽的文字报道中配以真实、恰当、多彩的图片,使社会新闻非常出众,特别在“马振华情死事件”“黄慧如、陆根荣主仆恋爱案”等重大案件发生期间,《时报》连续选登极具说服力的新闻图片跟踪新闻进展,有力地辅助文字报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从20年代后期开始,《时报》对重大体育比赛加大摄影报道力度,投入大量人力与物力参与新闻竞争,每逢全国运动会、远东运动会和世界运动会等大型赛事期间,《时报》常以单图、组图或图片专版的形式推出可视化的体育报道,并配上点睛的标题和精辟的解说文字,精心编排,体育版面呈现出生动的精彩瞬间、浓缩的新闻主题、多彩的体育花絮、合理的图片配置、整体的规模效应等编排特色,令读者过目难忘。

三、《时报》新闻业务革新与转型的社会影响

《时报》的业务革新成就卓著,对近代以来的报刊业务改革影响深远,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时报》新闻业务革新的积极影响

1. 前期《时报》引领近代报刊业务革新风潮

前期《时报》从现代版式和新闻体裁方面锐意进行新闻业务改革,在业务上的许多创举为当时报界起到示范作用,大大刺激了报业的革新欲望。该报在业务改革诸多方面独领风骚,成为我国报业改革的先驱,从形式方面引领了报业变革。当时,“晚清抱持着‘仇视敌对’的态度和‘中体西用’的理念,始终无法做到及时调整方针政策、适应历史大势和符合人民意愿,抱残守缺、昏聩无能无能,……”^[21],这种思想反映在新闻业务方面则是墨守成规,正如《时报》编辑包天笑所说:“狄氏的创设《时

报》，在上海新闻界不为无功，那正是申新两报暮气已深的当儿，无论如何，不肯有一些改革”。^{[7] (P442)}《时报》一创刊就以全新的样式与读者见面，打破了清末报界死水般的沉寂，激起新闻界很大的波澜，“以致它创刊不到一年，上海报界老资格的同行如《申报》《新闻报》等，不得不相继改版，以适应《时报》的挑战”^{[22] (P19)}。《时报》创刊后的半年内，多家报纸进行了改版，上海报界老气横秋的面貌大为改观。1905年2月7日实行改版的《申报》，刊发《本馆整顿报务广告》，列举了十二项具体改革措施，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新闻报》也步其后尘实行报业革新。在《时报》的刺激下，掀起了我国近代报刊业务变革的新一轮高潮，把中国近代报刊的业务整体向前推进。所以，报界这次业务革新不但成效显著，而且影响深远。

2. 后期《时报》新闻业务转型迎合都市市民消费心理

后期《时报》新闻业务转型的动力是黄伯惠选择“黄色”报纸的经营策略和发展路径，他走的“大型报纸小报化”之路迎合了都市化的市民消费心理。首先，后期《时报》把社会新闻作为摆脱前期《时报》颓势的突破口，以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作为报道对象，展示出五光十色的社会图景，不仅使读者得到消遣休闲，而且满足了读者关注自身生存境遇的信息渴求，有利于革除旧习，树立新风，同时还担负了舆论监督之责，净化社会空气，有利于社会良性发展，因此受到都市化市民的欢迎。其次，夺人耳目的体育新闻是《时报》提供给都市化市民生活的重要精神食粮。《时报》以丰富的内容、生动而怪异的写作手法和套红印刷的版面处理方式获得读者的好评。再次，新闻图片独占鳌头，成为后期《时报》的独特优势。大量的社会新闻通过文字报道与图片新闻同步呈现，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尤其是体育比赛中抓拍到许多新闻图片，真实、客观地呈现了赛场风姿和场外喜悦，使读者感觉亲历现场，吸引了都市读者的眼球，增强了阅读快感。可见，后期《时报》有效地探索出一条报刊与社会互动的途径，报刊内容满足了读者的需要，迎合了浮华都市的市民生活，以鲜明而另类的办报思路与同时期报纸形成区隔，打开销路，为报纸的涅槃带来了契机，从而使后期《时报》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3. 《时报》培养造就了一批著名的职业报人和记者群体

无论前期还是后期时报馆内都是人才济济，为清末民初一些报人提供了用武之地，在这里锻造出一批精明实干的报务管理者与新闻素养高的职业报人和记者，正是《时报》的新闻业务革新举措为他们提供了发挥潜能的良好契机，并成全了他们的美名。时报馆不仅造就了革新报界的报业老板狄楚青和黄伯惠，而且培养出许多出名的职业报人和编务人员，如陈景韩、罗孝高、包天笑、雷奋、戈公振、毕倚虹、蔡行素、吴灵园、金剑花、马群超、鲍振青、何西亚、王季鲁等，特别是培养了一批著名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徐彬彬、顾执中、金雄白、郎静山、滕树谷等，其中在中国新闻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有著名时评家陈景韩，“小说家报人”包天笑，“民初三大记者”黄远生、徐彬彬，“新闻全才”邵飘萍，著名新闻史学家戈公振，中国报坛上第一批专任外勤记者顾执中、金雄白，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专业摄影记者郎静山、著名体育记者滕树谷等，直至今日这些名字仍耳熟能详。可见，历时35年的《时报》如同人才培养的大熔炉，让他们在新闻业务变革实践中锻造了自己。

4. 《时报》对新技术的敏感加快了新闻观念的更新与发展

《时报》在新闻业务革新与转型过程中充分利用新技术，包括电报、电话、摄影和印刷技术等。首先，《时报》一创刊就注重利用电报技术传递新闻，新闻专电成为《时报》的必备内容，从创刊初期的几条、十几条到民国成立后的几十条，甚至整版刊登专电，新闻专电的拓展加快了新闻的全面、客观、时效观念的更新。其次，新闻图片是后期《时报》的主打内容，也是凸现新闻真实的绝佳手段，新闻摄影技术强化了新闻的真实、客观观念。最后，印刷技术推动时效观念的发展。后期《时报》从改良印刷以节约印刷时间来争抢发行时效，黄伯惠对印刷术极为敏感和娴熟，他耗巨资从德国购置的彩色印报机，每小时可印二大页报纸8.1万份（即单页16.2万张），印刷速度在国内领先，在快速的技术更新中增强了新闻传播的时效理念。在《时报》的激励下，清末民初报界充分利用并快速更新报业技术成为热潮，报业对新技术敏感，加快了业务革新步伐，从而推动了我国新闻报道全面、时效、真实、客观观念的更新和发展，并在新闻界形成共识，技术与观念的互动形成合力推动了新闻事业向前发展。

（二）《时报》新闻业务革新的消极影响

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视角分析,《时报》业务革新也存在不尽人意之处,主要表现在政治上不敏感、经济上不盈利、文化上不高雅。

1. 办报刻意远离政治有损办报使命

前期《时报》矢志于报纸业务改革,报刊舆论没有成为《时报》的主要旨意,尽管在清末民初重大事件发生后也发表过一些言论,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但与申、新两报相比,前期《时报》在言论方面没有太多称道的地方。黄伯惠执掌《时报》后,政治色彩进一步淡化,在报刊界引导舆论更是无足轻重。顾执中直言不讳,“《时报》在狄楚青时代,虽然在发行上远不及《申报》和《新闻报》,但在文化教育界颇有地位。……《时报》从黄伯惠接办到抗战后关闭,完全成了一家无灵魂的报纸”^{[23] (p36)}。黄伯惠主导“为报而报”的办报理念,“我国之纯粹为报而报,不杂丝毫政治或商业之观念者,当以黄氏为第一人”^{[24] (p34)}。所以,他的业务革新转向以大众喜好为中心,重点落在新闻题材方面,以大众化策略经营《时报》,新闻业务发生转型,注重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和图片新闻,走小报化的“黄报”之路,对原有的评论性栏目一减再减。据顾执中回忆,“《时报》自黄接办后,就没有正式的社论,仅有短评,等到后来,索性连短评也不要了。省得在政治上找麻烦,省得得罪人”^{[25] (p179)}。后期《时报》刻意远离政治,模糊政治倾向,因而,社会影响难以与同时期的《申报》和《新闻报》分庭抗礼。《时报》在最后岁月因不情愿接受新闻检查,有意以琐碎的社会新闻充斥版面而回避政治,短暂维持出版后面临政治抉择,最终为政治牵绊而吞噬,“辉煌一时的《时报》,……前后经历了三十五年,在风云变换的近代舞台上,终于成了新闻史上的一个过客”。^{[12] (p115)}

2. 办报没能盈利不利民营报业发展

《时报》前后期的业务变革始终没有充分发挥民营报纸的盈利功能。在狄楚青经营时期,创办之初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多方资助,从创办到1907年的四五年间约获资助二十万元,报刊盈利几乎没有提上议事日程。1908年后,该报逐渐趋近了江浙立宪派,但报纸在经营方面也没有得到改善,进入民国以后,该报依靠有正书局的挹注来维持,“入民国后,《时报》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时报》一度经济困难,入不敷出,狄楚青自己经营的有正书局却岁有盈余,他便采取剜肉补疮的办法,以有正书局盈余补《时报》不足”^{[26] (P134)}。这样维持了多年,终因步履维艰,狄楚青撒手解脱盘给黄伯惠。可见,办报盈利是前期《时报》无法实现的黄梁美梦。

后期《时报》走的是商业报纸的路子,但报纸盈利目的仍没有达到,这与黄伯惠的经营管理观念密切相关。首先,不计成本和回报的大手笔投入。他大撒资金购置设备,时报馆建设了居上海之冠的摄影室,购置优良的印报纸张,不惜成本添设当时雄冠亚洲的高速、套彩印刷机和配套设备。匪夷所思的是,黄伯惠为了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体育新闻,全然不顾成本参与新闻竞争,在第一次全运会期间,不惜租用专列车厢,“将记事和摄影交沪杭路火车,随班车送往上海,并在列车上设置暗房,于途中冲洗新闻照片,待车到上海即赶付制版,以争取时间”^[20]。甚至在这次全运会上还租用专机运送《时报》,“当时全国运动后在杭垣举行之某年,在十天的会期中,时报包专机一架,每晨由沪飞杭,专送时报,此在中国尚属创举”^[13]。其次,广告经营乏力。邵翼之曾指出《时报》经营广告的缺陷,“因篇幅关系,对广告方面未予特别注意,五彩印刷机亦未曾在广告上发挥效能,因此影响收入”^[13]。《时报》疏于广告经营,萎靡不振,所以,“《时报》广告费收入既敌不过出售报纸损失的浩大,所以每年要亏本”^[27]。

3. 煽情性“黄色新闻”遭世人诟病

后期《时报》的“黄色新闻”迎合了受众,给《时报》带来转机,但也确有过渡开发新闻资源之嫌。报纸通过大肆渲染、夸张煽情、配以图片达到耸人听闻的传播效果,降低了报格,麻痹了读者。所以,“当其时,上海各大报以黄伯惠如此做法,嗤为庸俗,叱为下流”^{[28] (P32)}许多“黄色新闻”出自该报的主力干将金雄白之手,张功臣指出金氏笔下的社会新闻,“竟敢冒天下不韪,源源刊登低俗不雅的新闻,未免遭到同业讥讽,被指责为胆大妄为,堕落无行”^{[12] (P143)}。尤其一些长篇累牍报道男女关系的猎艳新闻,长时期连续追踪推出,极尽煽情炒作之能事,一味求得轰动效应,更遭人非议。曾供职该报的顾执中痛心地提到,“原来文化气息很浓厚、在文化教育界畅销的《时报》,自此便日趋于庸俗。过了二三年,当戈公振先生和我离开该报以后,

《时报》不但庸俗，而且一变而为满纸充斥着十足下流的以大量篇幅描写男女关系的黄色新闻的报纸，因此，其报格日趋低落，不为社会所重视”^{[22] (P179)}。更为甚者，有些“黄色新闻”有伤风化，消弭意志，甚至传播了不恰当的价值观。所以，对“黄色新闻”过分渲染会麻醉人们的身心，使读者无法理性审视自身生存际遇，肤浅化、表面化的报道更无法达到对人性的深度追问，所以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四、结论

上海《时报》发展历程中最核心的成就在其业务革新，前期《时报》在现代版式创新和新闻体裁革新与定型方面意义重大，从报刊形式方面引领了近代报业变革风潮，后期《时报》在新闻题材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以迎合受众为旨趣，从传播内容方面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两个时期的业务探索都触及《时报》新闻业务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分别从新闻业务的不同方面推动了我国报刊业务的发展，契合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需要。如果撇开时空，当今报业吸纳《时报》许多有益的做法和经验，承继其大胆革新的勇气和业务改革的优良传统及规律性内容，对推进报业在新媒体环境下进一步改革不无裨益。因此，从《时报》的整体发展历程上看，虽然《时报》在舆论上表现相对平庸，但业务上有颇多建树，而且影响深远，它的业务革新成就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 [1]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 [2] 胡适. 十七年的回顾 [N]. 时报, 1921-10-10.
- [3] 老汉. 时乎时乎 [N]. 时报, 1932-06-27.
- [4] 林语堂. 中国新闻舆论史 [M]. 刘小磊,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5] 读本报问答 [N]. 时报, 1904-10-13.
- [6] 戈公振. 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 [G] // 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 上.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1979.
- [7] 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 [8] 马光仁. 上海新闻史 (1850—1949)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 [9] 宋三平. 论黄远生《申报》时期的新闻实践及其特点——兼与《时报》时期比较[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11).
- [10] 徐铸成. 旧闻杂忆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 [11] 高拜石.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六)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 [12] 张功臣. 民国报人——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 [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
- [13] 邵翼之. 我所知道的上海时报 [J]. 报学, 1955 (1-8).

-
- [14] 熊月之. 上海通史: 第9卷·民国社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15] 林郁沁. 施剑翘复仇案: 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 [16] 东鳞西爪[N]. 时报, 1935-10-10.
- [17] 陈荣棠为《时报》题词[N]. 时报, 1935-10-16.
- [18] 卢慧娟. 从巴赫金的“文化狂欢”理论分析贺岁电影《桃花运》[J]. 电影文学, 2009(5).
- [19] 陈祖民. 郎静山重访上海滩[J]. 新闻记者, 1994(1).
- [20] 童轩荪. 奇人黄伯惠·南北画报潮[J]. 传记文学, 1970(17-1).
- [21] 施欣. 论中国古代报刊近代化嬗演的历程、特征与启悟[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6).
- [22] 义勤. 被人淡忘的老《时报》[G]//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6).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 [23] 顾执中. 一所并不理想的新闻学校[G]//新闻研究资料(26).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 [24] 郑逸梅. 郑逸梅选集: 第6卷[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 [25] 顾执中. 报人生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自述[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 [26] 刘家林. 中国新闻通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 [27] 谢菊曾. 再忆《时报》[J]. 随笔, 1981(16).
- [28] 包天笑. 报坛怪杰黄伯惠[J]. 大成, 1984(131).